



□ 王子今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以一百三十卷的篇幅，记述了从传说时代黄帝至汉武帝执政时期的历史。《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列为“二十四史”的第一种，被看作史学和文学共同的经典。《史记》开创的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记述历史的体例，形成了久远的影响。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扬雄《法言·君子》说：“《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桓谭《新论》也写道：“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从残小论。”班彪曾经赞誉这部名著“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视前，圣人之耳目也”。《论衡·案书》又有这样的评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河汉也，其余，涇渭也。”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赞赏司马迁“博物洽闻”，其书则“驰骋古今”。历代评价之所谓“千古之至文”，“群史之领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都体现出《史记》深刻宏远的文化影响。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在承受酷刑、身负屈辱的特殊情况下完成的。他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保留了社会历史记忆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对于殷商史事，少有其他文献提供相关信息，而千百年后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以及考古诸多实证，说明《史记》包括商王世系等有关记录大体是真实可信的。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与外交，对于秦统一的历程，对于楚汉战争的演进，对于刘邦建国史、文景之治的实现以及汉武帝时代的诸多成就，《史记》也都有生动具体的描述。顾颉刚说，有关刘项竞争的记录，“笔力之健”，“震撼一时，叱咤千古”，而《史记》中另一“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即“武帝之世”。“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光照千古”。司马迁写当代史，多有清醒的历史判断以及勇敢的历史批评发表。后来有以“谤史”相指责者，而多数读者通过《史记》则为史学的良心和史学家的骨气所感动。

李长之曾经评价司马迁《史记》：“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 活经验，生活背景，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因此，我们必须能把握《史记》中司马

核心阅读

► 《史记》的平民精神，体现出对历史真实的看重，显示了历史判断的公正，也表现了史家的开明与智慧。

► 我们捧读《史记》，仿佛与文化伟人交谈，在阅读中感知作者的文化人格，理解作者的文化精神，体会作者的文化智慧。

迁之主观的用意，才能理解这部书，才能欣赏这部书。”可能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文化个性，“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我们捧读《史记》，好像与这位文化伟人交谈，可以亲近他的文化人格，可以理解他的文化精神，可以体会他的文化智慧。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对司马迁与他所处时代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汉武帝进行过比较。他注意到这两位历史名人有共同之处：“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史记》成书，并成为史学史上的高峰，文化背景正是汉武帝时代的历史进步。然而，司马迁又超越了他生活的时代。“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和黯然无光了！”“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然而另一方面，“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上的人”。司马迁与汉武帝共有彼此辉映的历史光芒，然而就文化高度而言，前者又压倒后者。重要原因之一，是《史记》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平民立场、平民情感和平民理念。

对社会普通人群的关心，是《史记》最突出的文化特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写道：“（《史记》其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

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他关注司马迁此奇异之“深意”，于是感叹：“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翦伯赞也说，“《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叛乱的首领陈涉写家；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商人、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写列传。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他认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对社会低端“阶层”的关注，是《史记》作者独特的视角。

我们在对汉代的儿童劳动与劳动儿童进行考察时注意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追述自己早年经历，曾经回顾在“年十岁则诵古文”之前，有“耕牧河山之阳”的劳动实践。司马迁童年体验过“耕牧”劳动生活，使得他与社会下层劳动群众能够情感接近，心灵相通。《史记》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的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也理解劳动阶级的身心体验，应当与这样的童年生活有关。《史记》于是并不仅仅瞩目帝王将相的历史表演，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说，能够“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

对一些历史名人早年贫困生活与劳动经历的关注，是《史记》独自的文化个性，因此超越诸多其他史书而显现出社会史观察的独特眼力。如刘盈兄妹幼时随吕后参与田间劳作的故事，见于《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所谓“两子”，就是刘邦帝业后来的继承人汉惠帝刘盈和嫁给张敖、成为赵国王后的鲁元公主。《汉书·高帝纪上》只说“吕后及两子居田”，缺写了“耨”的劳作细

节。也许班固认为“耨”作为具体田间劳动形式并不重要，然而司马迁因为这一个字的使用，就表现出历史见识的高超。《论衡·骨相》从《汉书》说。《通志》卷五上《前汉纪·高祖》则认同《史记》的笔法。汉文帝窦皇后弟弟窦少君幼年被拐卖从事苦役的故事，见于《史记·外戚列传》。窦少君“年四五岁时”，“为人所略卖”，“传十余家”，从事“入山作炭”劳作，曾经遭遇地质灾害，经历生死劫难，“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后来得与窦后相认，随后方跻身豪贵集团。又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大将军卫青私生子出身，“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这位为汉帝国扩张创立显赫军功的名将，“少时”曾“牧羊”，经历过屈辱生活。《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述，汉武帝时名相公孙弘早年“家贫，牧豕海上”。据《史记·平准书》，卜式在得到汉武帝信用之前，“以田畜为事”。他后来回顾人生初年经历，自称“少牧”。司马迁对这些故事密切关心，认真写述，是有史家的深意的。我们由此也可以体会他以经历“耕牧”劳动生活为人生基点的“精神史，心灵史”。

司马迁童年曾经从事“耕牧”劳动，后来官任太史令，得以在帝王身边服务，然而如他自己所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而经历人生悲剧，“诟莫大于宫刑。”如《报任安书》所说，“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圜墙之中”，他是在身处卑贱屈辱的社会下层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记》的撰写的。这当然可以使得他容易亲近平民的生活，理解平民的心思。

《史记》以平民精神表现出来的文化优势，超越“千古”“群史”，成就了中国史学公认的经典。

《老子》说：“强大处下。”“高以下为基。”“大者宜为下。”司马迁正是立足“为下”“处下”的立场，占据了史学学术的制高点。《史记》的平民精神，体现出对历史真实的看重，显示了历史判断的公正，也表现了史家的开明与智慧。

历史文化典籍



计的品质”。

明代江南有不少优雅隽永的佳作，何以如此？明清之际的张岱在《夜航船》的序里留下一段文字，可供我们索解：“唯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而未尝不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当时的手艺人“无不读书”而有“学问之富”。文化遗产的利用，首先要求利用者有文化，而不只是简单运用什么元素。

王国维先生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认为，“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而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同样强调了文化修养对于理解“古雅”的津梁作用。可见，文化修养的培育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任重而道远！

推动教育与信息化深度融合

□ 任友群

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发展的时代标签逐渐从“后工业”转变为“信息化”。遥想改革开放之初的1983年，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首次被译入国内，书中所提出的“信息化时代”引起了国人瞩目。其时，因特网才刚刚进入历史舞台，虽然无数人为托夫勒的预言所激励，但恐怕少有人能相信数十年内全球将掀起“信息化”的巨浪。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接踵而来时，我们感叹“托夫勒走了，世界依然活在他的预言里”。

与工业化时代由大机器、大工业和大量人员所从事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不同，信息成为了信息化时代的关键资源。具备信息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处理、信息再生、信息利用功能的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化生产工具成为了社会主要生产力。而“信息化”就是这个培养、发展以信息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社会的历史过程。在今天的语境中，“信息化”既是对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所发生变化的实然描述，又是对国家发展方向与目标的应然指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早已把“信息化”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

今天，工业化、商业信息化、医疗信息化、金融信息化、政务信息化等等的层出不穷不仅正从各维度全面提升着世界的信息化水平，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领域的面貌。但与其他领域与信息技术、信息化之间的“单向依附”关系不同（这里说的“单向依附”指的是这些领域只是单纯地通过“培养、发展以计算机等信息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从而实现该领域的变革与发展），教育与信息技术、信息化之间是一种“双向依附”关系：即一方面教育固然需要信息技术、信息化的深度介入实现效能的跃升；另一方面信息化时代更需要“教育”出更多、更好的能适应甚至是引领信息化时代的人才，而这两者合于一处才是“教育信息化”的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要更好地融入信息化时代已不仅仅事关教育自身，同时也是信息化时代的要求；而要使教育更好地融入信息化时代的关键就是推进教育信息化。

积极、有效地推进教育信息化已是国家战略、社会共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信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指出要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从全球教育发展趋势和教育信息化发展形势来看，要积极、有效地推进教育信息化，使教育能更好融入信息化时代，从而让教育这项人类最古老的行为绽放出新活力，关键是要从“技、艺、道”三个层面入手。

首先是“技”，即要实现教学工具、设施，教育装备、资源的信息 化。从近年的实际来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类教育机构对教学工具、设施、装备、资源的信息化的投入已经不少，学校宽带接入率，计算机、多媒体教室、多媒体教学资源 的数量都有长足的增长。但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所投入的工具、设施、装备、资源是不是能符合“信息化生产工具”的内涵？如前所述，“信息化生产工具”的特点就是能便捷、有效、快速地获取、传递、处理、再生、利用信息，如果不能达成上述要求，那这个“生产工具”最多只是“电子工具”，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生产工具”。二是投入方式是不是能跟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脚步？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今天呈现出“曲棍球式曲线”特征，尤其是各类终端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如果是追着趋势买终端，那结果一定是捉襟见肘，因为资源毕竟有限。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教育机构应当要因应世界信息化发展潮流，调整教育信息化的政绩观，要“重应用”，把有限的资金投入 到“网”“云”和在线资源的建设上来，而在“端”的部分则可以采用“自带设备（BYOD）”“外包租用”来加以推进。

其次是“艺”，即要实现教学、管理、服务模式的信息 化。海德格尔曾言：“技术之所是，包含着对器具、仪器和机械的制作和利

用，包含着各种被制作和被利用的东西本身，包含着技术为之效力的各种需要和目的。这些设置的整体就是技术。”从中不难看出，工具、设施、装备、资源只是达成技术目的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利用好”这些工具，技术目的就将落空。而要“利用好”这些工具，关键就是要从目标入手，研发出与各类信息化工具相适应、相匹配，从而能最大限度发挥其潜在价值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而这些就是教学、管理和服务模式的信息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模式的信息化应当要走在工具的信息 化之前：有了成熟的模式后，工具才不至于成为摆设。需要指出的是，好的模式一定是教学者、管理者、服务者与技术开发者深度交流、“妥协”（即对于模式和技术的不 断修正）后的产物，因此教育信息化推进者要特别注重创造教学者、管理者、服务者与技术开发者的交流环境。

最后是“道”，即要把信息 化纳入育人目标之中。教育的目标是“立德树人”，所谓“育人目标的信息 化”，实际上指的是要把培养适应、引领信息化时代人才作为发展教育、推进教育信息化的 一大核心目标。什么是信息化时代的人才？该怎样培养信息化时代的人才？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九个要求”为这两个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需要注意的是，教育信息化的确可以成为助力落实“九个要求”的根本途径，但同样也可能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这是广大教育信息化推进者要特别警惕的。

没有信息 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教育信息 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没有教育信息 化，也就没有信息化时代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教育部出台了《教育信息 化2.0行动计划》，“技、艺、道”三个层面在《行动计划》中都有明确的体现和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与信息 化时代的融合之路也必将因此越走越宽。



作为资源的文化遗产

□ 杭侃

英国有一本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教科书《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书的序言指出遗产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关乎过去，而是我们与现在、未来的关系，其中，“我们的选择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当代所持并希望能带进未来的某种价值体系”。

当前，文化遗产之所以越来越受到重视，是因为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资源，而这种资源不可再生，我们有义务完成代际之间的传承。因此，任何对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都应当以保护为前提。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片面地强调保护，而忽视它的资源属性。近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由于没有综合考虑到国计民生和中国文化遗产的特性，文化遗产还没有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加以充分利用，一些部门甚至将文化遗产当成社会发展的一种羁绊，口头上谁都不会说不保护文化遗产，但实际的保护效果并不理想。

要切实保护和利用好文化遗产资源，就需要认识其价值。《世界遗产公约》强调了文化遗产在历史、艺术、科学方面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当中的人，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最容易被感知。对于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前人的智慧，培养公众的科学精神。对于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科技在飞速进步，但艺术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许多原始艺术也很具有当代性。

关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近些年来学界又提出了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